

《中国不高兴》



本书的大多数作者都属于中国的“公众人物”，他们的立场观点，早为人们所知。本书可以说是他们观点的一次完整“集结”。本书的出版引起了中国内地学界和思想界的广泛争议。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中这样定义：“这是继1996年不满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影响的一部民族主义畅销作品。”

宋晓军 王小东 黄纪苏 宋强 刘仰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日本走向何方》



作为一名日本外交官，作者小原雅博首次揭开了日本外交的内幕。通过剖析日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清晰的日本国家利益观的演变过程，说明了日本外交从一战、二战一直到冷战结束后的新世纪，发生了怎样的惊人转变。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核心问题，并大胆提出了对中新关系的新思维。

[日]小原雅博著 中信出版社

《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



1931~1935年，博古（秦邦宪）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遵义会议后离开中共总书记职位。本书作者是博古的侄子，从杨琳（秦邦礼）、潘汉年、严朴等知情人处听来的珍贵“历史故事”，以博古为主线，主要描写四次反围剿、湘江血战、遵义会议、王明与潘汉年的特殊关系、徐向前拒绝跟毛泽东走等重大历史事件，涉及毛泽东等人在中央苏维埃早期的活动。

秦福铨著 香港大风出版社

《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



1931~1935年，博古（秦邦宪）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遵义会议后离开中共总书记职位。本书作者是博古的侄子，从杨琳（秦邦礼）、潘汉年、严朴等知情人处听来的珍贵“历史故事”，以博古为主线，主要描写四次反围剿、湘江血战、遵义

会议、王明与潘汉年的特殊关系、徐向前拒绝跟毛泽东走等重大历史事件，涉及毛泽东等人在中央苏维埃早期的活动。

秦福铨著 香港大风出版社

对陶希圣最私人的评论和私人书信涉及政治与社会，而胡适对陶希圣在陶本主义”等概念大法准确描述中国历史新名词冒充新思想但大体上接受了胡点滴”，感叹于其少见早年滥用概念入历史潮流之中摸爬的率性表达。

与陈布雷一样，换个话说，就是“心腹”。关报《中央日报》的总主笔、总编辑陶希圣，王竹村自定影响极大的《中国之命运》，读其回忆录，一个很深刻的感触就是，陶希圣对蒋介石可谓忠心耿耿，对国民党可谓矢志不渝。有趣的是，胡适、傅斯年、蒋廷黻等同样曾在国家危难之际入阁的大学教授对国民党政府多有严峻之批判，在日记或书信里对蒋介石多有腹诽，或许由于陶希圣角色之特殊，他对国民党政权之失利极少有深刻反思，对蒋介石更未见只言片语之含蓄非议。自然，这也可能与晚年陶希圣身在台湾的戒严环境而言论受有限有关。

不过，通观全书，最让读者感兴趣的是所谓高陶事件。陶希圣一度是汪精卫的心腹，也深度参与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与日本政权的秘密协议的筹划。可是，在关键时刻，他没有签字，并成功从上海逃亡到九龙，且联名公开发布秘密协议的内容。陶希圣如此描述其转变：“我是参加谈判之一人，一眼见那日本军阀分割中国的野心企图，白纸上黑字，要借中国人之手去签字，这件事是断不可为的。当晚，我回到法租界环龙路私宅，即称病不出，与内子冰如计议如何脱险走港。”谈判的过程，陶希圣一直参与其中，而与汪精卫等更是亲密接触，为何一直到最后要签字的时候，陶希圣才因为“爱国主义”而幡然

有其不得已的理由，而他积极保护北大校产，保护教授，消极抵抗日军之种种事情也陆续为历史研究所证实。陶希圣一家在九龙的逃亡隐匿经历，让我们后人读来，觉得恍若是在以活着之艰辛备尝来抵消曾经之堕于非之边缘的罪过。

金冲及的《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傅国涌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各自聚焦在内战之中的关键年份，尤其是后二者主要关注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处的心路与困境。陶希圣很难用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个身份来限定，尽管他也曾是北京大学教授，在自由派的阵地《独立评论》和《大公报·星期论文》上也多有政论之表达，在离开还是留下之间，作为“喉舌”的陶希圣几乎不需要作出选择，也就不必要面临天人交战之苦痛。前面列举的著作多是以留居大陆知识分子为分析对象，陶希圣这本传记则为研究离开大陆而奔赴台湾的知识群体提供了史料，至少可以打开被尘封的历史的另一面，让我们惊觉原来对于同样的一段时间，居然有着如此截然不同的感知方式和历史追忆，这未必不是对人性与人生的丰富。

□ 编辑 晓波 □ 美编 黄静